

二十一世紀評論

改革開放：回顧與反思

中國經濟改革四十五年的 思考札記



或學而有得，或思而有得，輒札記之。

——王筠《菴友臆說》^①

今年是中國經濟改革的四十五周年。如何解讀改革歷史過程，如何評估改革意義和歷史貢獻，這將是中國改革史專家的工作。可以預見，關於對中國改革認知的分歧，還會長期存在下去，將是中國當代史研究的重大課題。在中國經濟改革四十五周年之際，本文以札記的形式記錄我的若干思考，與讀者和朋友分享。

一、**中國改革結束的時間節點**。中國改革是重大的歷史事件。古今中外，凡是重大的歷史事件，不論是革命，還是改革、變法，以及社會動亂和戰爭，都是有時間性的，絕不可能沒有「終點」。至於為甚麼存在「終點」和如何確定「終點」，一般是由後代歷史學家評判的。例如，商鞅第一次變法的時間是自秦孝公三年（前359年）至秦孝公九年（前353年），大約為時六年；王安石變法的時間自熙寧二年（1069）開始，至元豐八年（1085）宋神宗去世結束，歷時十六年；張居正變法的時間自萬曆元年（1573）開始，至萬曆十年（1582）張居正去世結束，前後九年。中國近代史上的戊戌變法，時間短暫，僅一百餘天。至於洋務運動，自1860年代至1890年代的甲午戰爭，約三十餘年。顯而易見，任何一次具有歷史變革意義的大事件，都不存在時間長短的統一標準。所以，不應該將重大歷史事件的長程影響與事件本身的時間框架混淆。中國已經到了需要承認和接受經濟改革結束的現實的歷史節點。當然，以哪個具有特定意義的時間節點作為結束，是需要論證的。例如，中國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（WTO），可以作為改革結束的一個時間節點。無論如何，中國改革不應該成為「沒有終點」的歷史事件。

二、**中國改革的目標**。1978年，中國之所以實施經濟改革，根本原因是經過文化大革命的中國經濟陷入結構性和制度性危機，所以改革初始階段的目標是有限的和具體的。例如在農村，從給農民以農業生產的自主權開始，然後是接受和支持家庭聯產責任承包制。至於最終廢除了人民公社體制，可以視為水到渠成，並非是預設的目標。但是，因為太多的歷史原因，中國改革的目標從有限的和具體的不斷疊加，致使改革已經成為無所不包的歷史運動。在政府和民眾用語中，不同領域都出現與「改革」相關的名詞，如農村改革、國企改革、金融改革、市場改革，等等。中國已經進入到了一種泛「改革」概念的歷史時期——改革口號化：「改革是個筐，甚麼都可以往裏裝」。在這樣的情況下，改革需要不斷描述終極目標，終極目標進而變得愈來愈抽象化。例如，改革的目標是構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，其中的「中國特色」和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」都需要再定義，導致話語和邏輯表達的危機。

三、**中國改革的參照系**。當下的世界和四十五年前的世界有了根本的不同，發生了鉅變，有些屬於根本性的和不可逆轉的改變。四十五年前，世界人口42.9億，當下是80億；四十五年前，全球國內生產總值(GDP)是8.6萬億美元，2022年已經超過100萬億美元；四十五年前，冷戰尚未結束，影響着全球地緣政治，柏林圍牆還是冷戰的象徵，現在不僅德國實現統一，而且歐盟已經包含了德國在內的二十七個主權國家；四十五年前，互聯網技術有了一系列重大突破，但是互聯網時代還沒有到來，現在已經超越了互聯網時代，進入數字和人工智能時代。特別值得注意的是，四十五年前的世界，正是市場經濟的黃金時代，列根主義(Reagan Doctrine)和戴卓爾主義(Thatcherism)風頭強勁；如今，市場經濟陷入全方位危機，2008年的世紀金融危機的「後遺症」至今無法消除。四十五年前，生態危機已經被關注，現在成為最大的人類課題之一。當中國改革的參照系不斷改變，中國經濟改革的大環境開始進入持續不穩定狀態，逼迫中國改革作系統性調整。所謂「摸着石頭過河」的決策模式，因為水的深度和流速改變、石頭的大小高低不同，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的衝突加劇。

四、**中國改革和經濟成長**。中國改革的最顯著效益是經濟伴隨改革成長，並持續產生全新的問題。1978年，中國GDP規模是0.15萬億美元，人口9.6億，人均GDP為156.4美元；2000年，中國GDP規模是1.21萬億美元，人口12.6億，人均GDP為959.4美元；2020年，中國GDP規模是14.69萬億美元，人口14.1億，人均GDP為10,408.7美元。因為中國經濟的高速成長，經濟改革的內在動力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，從以解決溫飽問題為動力，轉變為以構建小康社會或者準福利社會為動力，改革已經發生了轉軌。按照國際標準，中國從典型的發展中國家轉型為「新興市場經濟國家」。在這樣的背景下，原本改革必須面對和解決的問題，例如「三農問題」，不僅得到緩解，甚至在很多區域得以解決。但是，卻產生了全新的問題，例如土地財政和房地產泡沫，特別是所謂的「中等收入陷阱」如影相隨。於是，中國改革陷入悖論：如

果中國依然要繼續1978年的改革模式，將無法適應全新的經濟和社會問題；如果以全新的經濟和社會問題作為改革目標，則必須放棄傳統改革的理念和框架。

五、中國改革和全球化背景。過去四十五年中國改革最重要的外部環境，正是全球化從興起到衰落的完整周期。在二十世紀80至90年代，伴隨冷戰完結，形成基於科技革命，特別是信息和互聯網技術支持的、跨國公司主導的全球化浪潮。在此次全球化浪潮中，工業、科技和金融的互動結構得以形成。工業資本、科技資本和金融資本的融合，加速從產業間垂直分工向產業內垂直分工轉變，重新構造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。中國不僅參與了此次全球化，更成為世界製造業的中心，實現貿易總額世界第一和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。期間，中國加入WTO。中國經濟改革和開放是不可分割的，而開放和全球化是互相聯繫的。中國在成為全球化受益者的同時，需要接受全球化既定的「遊戲規則」，在金融和科技領域尤其如此；國際貨幣基金組織(IMF)的規則就是世界金融秩序的基礎。從大歷史視角看，中國改革影響和塑造了此次全球化模式。但是，至少自2018年以來，全球化開始衰變，中美貿易摩擦和科技領域日益激化的競爭，意味着中國改革和此次全球化周期的互動歷史的結束。

六、中國改革和不斷加速的科技革命。四十五年前，在中國經濟改革開始的時候，世界性的科技革命還處於蓄勢待發的歷史時期。進入1980年代，特別是1990年代，計算機、集成電路、互聯網革命全面爆發，矽谷成為全球高科技重鎮，形成了包括國際商業機器公司(IBM)、微軟(Microsoft)、蘋果(Apple)、谷歌(Google)、Meta和亞馬遜(Amazon)等大型高科技公司，全球急速進入大數據、雲計算和互聯網一體化時代，進而進入基於2G到5G的移動互聯網時代。作為反映集成電路發展規律的「摩爾定律」(Moore's Law)，影響了數字和信息時代的走向。與此同時，人工智能和量子科技獲得不斷加速的發展。2022年，人工智能生成內容(AIGC)獲得根本性突破，ChatGPT代表的大模型全面進入人們的經濟和社會生活，芯片竟然成為了影響中國經濟改革的技術變量。中國經濟改革必須跟隨前沿科技的演變，在繼續工業科技追趕的同時，追趕全球數字科技和智能科技的新浪潮。問題是，這樣的追趕勢必要求中國的教育和科技體制進行深入的改革，導致中國改革重心的轉移。

七、中國改革和指導改革的觀念與理論。1978年中國開始經濟改革，並非已有一套完整的觀念和理論。中國經濟改革的思想資源是非常有限的，更構不成體系。具體說，經濟改革的思想資源主要包括：馬克思主義經濟學，特別是馬克思的商品經濟理論；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經濟改革理論；中國本土經濟學家對於計劃經濟的批判和反思；部分西方現代經濟學理論，例如管理學和計量經濟學。如果說中國經濟改革產生了理論，主要是來自本土經濟學家根據經濟改革實踐所做的總結。在這方面，老一代經濟學家作出了創造性的貢獻。例如，關於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和結構調整、在科技革命政

策方面的理論性總結，代表人物包括中國共產黨革命家、理論家和經濟學家薛暮橋、杜潤生和馬洪^②。問題是，伴隨經濟改革引發的經濟制度的多元化、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接軌，中國改革的理論滯後日益嚴重。在過去的一二十年中，中國經濟的實際演變和關於中國經濟的整體性認知、系統理論已經分道揚鑣。

八、中國改革的政治內涵。在1980年代後期，人們普遍認為經濟改革需要和政治改革配合。當時的政治改革的內涵，存在顯而易見的歷史局限性。進入1990年代之後，蘇聯解體，中國改革的政治內涵發生了調整和修正，主要集中在持續不斷地頒布和實施新的法律和法規。在過去十年，中國對執政黨進行了前所未有的治理。與此同時，執政黨、政府和企業的關係發生了多次改變。客觀而言，所有這些都可以視為具有政治內涵的改革。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，西方發達國家的傳統民主制度發生普遍危機，對中國政治改革的制度選擇影響至深。中國如何實現經濟和政治的均衡改革，顯然還需要長時間的探討和實踐。

九、中國改革的「代際效應」。開啟中國經濟改革的第一代是鄧小平和陳雲等中共元老，他們大多數是在二十世紀初出生的；之後，主導中國經濟改革的決策集團成員先後經歷和跨越了二十世紀20、30和40年代；現在已經進入50和60年代出生的，即「生在新中國，長在紅旗下」的一代。從二十世紀前半葉到50、60年代，中國的經濟、政治和社會制度與結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革，從一個農業國家轉變為工業化國家，經歷了計劃經濟制度和文革，再到改革開放，期間所形成的「代際差異」背後是教育和時代的差異。這樣的「代際差異」形成了改革過程的不同「代際效應」，體現在不同代際的改革戰略和政策的差別。更值得重視的是，不同代際對於改革的訴求是很不相同的。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，中國改革一方面要滿足老齡化的社會群體，另一方面要滿足「80後」、「90後」，甚至「00後」群體，也就是要同時滿足至少X、Y、Z三個世代的訴求。這對任何歷史變革而言，都是前所未有的挑戰。

十、中國改革的「異化」和「既得利益集團」。中國在改革之前，實行的是計劃經濟和平均主義的分配制度，全民處於低收入和低消費狀態，不存在社會階層的貧富差別。這樣的情況在進入1990年代之後發生改變：中國開始形成資本和權力的結合，逐漸形成「既得利益集團」，即所謂的「權貴資本主義」。進入二十一世紀前後，這個「既得利益集團」呈現出家族化趨勢，有再現中國歷史「門閥士族」的跡象。改革因為派生出來的「既得利益集團」而發生「異化」，而被「異化」的改革則加劇「既得利益集團」的膨脹。這樣的現象使得提高反腐力度成為不可避免的選擇，是改革早期的規劃和設計所始料不及的。更為嚴重的是，反腐本身也是系統性社會工程，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改革的正當性和社會基礎，蠶食了改革的成果，最終影響了改革模式。改革的「異化」也出現在古今中外的改革史中，但是當代中國改革在如此短的時間產生如此體量的「既得利益集團」，值得深入研究。

十一、**中國改革和社會結構的多樣化**。四十五年前的中國社會結構相當單一。在農村，實行以「三級所有、隊為基礎」的人民公社制度，農民都是公社集體經濟的成員；在城市，大部分居民在國有（全民所有制）企業和集體企業工作，「單位」構成社會組織的基礎。在那個歷史階段，受到城鄉戶口和商品糧制度的限制，幾乎不存在人口從農村向城市流動，以及城市之間的自由遷徙。伴隨經濟改革，人民公社制度終結和商品糧限制取消，城市化的發展，企業所有制的多樣化，特別是互聯網和自媒體時代的到來，信息社會快速形成，這一切導致社會全方位的多樣化。改革初期所面臨的單一和簡單社會結構不復存在。例如，2020年代和1980年代的教育制度和教育體系已經不可同日而語。自1992年至今，國家已經實施近三十年的九年義務教育，高等院校本科生招生規模從1978年的34.5萬人增長到2022年的467萬人。特別是建立在移動互聯網基礎上的自媒體，已經深刻地改變中國民眾的個體、家庭和社會交流方式，且派生出「網紅經濟」。可以預見，未來的社會結構將更為多樣化和複雜化。企望改革完全適應這樣的社會趨勢，非常困難。

十二、**中國改革和常態化治理**。中國經濟改革已經進行了四十五年。如果寄希望於改革可以繼續解決所有的宏觀和微觀經濟問題，勢必造成改革的「不可承受之重」。事實上，經濟從來存在其內在規律，人類的經濟活動從來是鮮活的。經濟周期的運行、經濟增長速度的波動、通貨膨脹率的上升和下降、失業規模的擴大與縮小，只要在最終可控和社會可以接受的範圍內，都是正常的經濟現象，如同天氣的變化一般。經濟改革需要和日常經濟活動脫鉤，不要繼續寄希望於「改革紅利」的邊際效益。已經持續四十五年的改革需要轉變到常態化治理的歷史階段。所謂經濟領域的常態化治理的定義就是：大規模和制度性變革分解為局部和日常性的治理，在治理過程中並不排除必要的結構性改革。

十三、**中國改革和經濟發展階段**。從大歷史的角度看，四十五年前開始的經濟改革，正處於中國從工業—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的歷史階段。經濟改革無疑成就了中國的工業化。在二十年左右的時間內，中國實現了美國經濟學家羅斯托（W. W. Rostow）所說的「經濟起飛」，進而連續完成了「向成熟發展」階段、「高額群眾消費」階段和「追求生活質量」階段的過渡^③。在世界近現代經濟史上，這樣的情況只有1990年代德國統一之後的三十年經濟發展史類似。現在中國正在向數字化和人工智能化社會轉型，對於發生於工業化歷史階段的傳統改革顯然是「勉為其難」了。任何歷史階段和任何時代都有特定的改革，甚至革命，所以不存在可以跨越不同歷史階段和時代的改革運動。

十四、**中國改革和世界性變革**。回顧自工業革命以來的近現代經濟發展歷史，從英國到歐洲大陸和北美，各種改革和變革從未停止。在二十世紀，還有過計劃經濟的歷史實驗、羅斯福新政（Roosevelt's New Deal）、凱恩斯革命（Keynes Revolution）。人類歷史上的所有改革和變革都存在雙重目標：一方面要解決現實的經濟危機和困境，另一方面希望過渡到一個完美的經濟制度

和狀況。歷史證明，實現第一個目標是可能的，實現第二個目標是難以做到的。其深刻原因在於，基於理性主義的完美經濟制度，如瓦爾拉斯均衡 (Walrasian equilibrium) 和帕累托最優 (Pareto optimality)，或者實現美國經濟學家阿羅 (Kenneth J. Arrow) 所說的「社會選擇與個人價值」的平衡^④，似乎永遠是可望不可即的。正因為如此，人們總是存在改革和變革的內在衝動。在這樣的意義上，不會發生「歷史的終結」^⑤。二十一世紀以來，世界各國都意識到來自經濟和政治制度、社會組織改革的訴求。例如，一些經濟學家和政治家所倡導的，也在一些國家進行實驗的「全民基本收入」(Universal Basic Income)^⑥，很可能引發全球性的經濟改革浪潮。現在風行於世界，並為廣大年輕人所接受的 Web 3.0 和 DAO 正在帶動着全球另一類的改革方向^⑦。

在本文結束之際，不得不提出一個更為嚴肅的問題：2023年11月9日，蓋茨 (Bill Gates) 在他的官方博客上發表文章預測：五年內每個人都將擁有人工智能私人助理——無論你是否在辦公室工作，並稱「它們將徹底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」^⑧。如果到了這樣的歷史階段，是否會發生人工智能推動的改革呢？如果這是大概率事件，便很可能發生人工智能驅動的世界性改革，而這樣史無前例的改革將改變人類文明形態和全人類的共同命運。

註釋

① 王筠：《葦友臆說 附錄》(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)，頁1。

② 參見薛暮橋：《薛暮橋回憶錄》(天津：天津人民出版社，2006)；杜潤生：《杜潤生自述：中國農村體制變革重大決策紀實》(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2005)；馬洪：《馬洪改革論集》(北京：中國發展出版社，2008)。

③ W. W. Rostow, "The Five Stages-of-Growth—A Summary", in *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: A Non-Communist Manifesto* (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1991), 4-16.

④ Kenneth J. Arrow, *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* (New York: John Wiley & Sons, 1951).

⑤ Francis Fukuyama, "The End of History?", *The National Interest*, no. 16 (summer 1989): 3-18.

⑥ 也稱為「無條件基本收入」(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)或者「全額基本收入」(Full Basic Income)。

⑦ Web 3.0是指以區塊鏈等技術為核心的下一代分布式的互聯網形態，通過數字身份、智能合約等技術手段，重構數據所有權、控制權和使用權。DAO即非中心化自組織 (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)，是一種將組織的管理和運營規則以智能合約的形式編碼在區塊鏈上，從而在沒有集中控制或第三方干預的情況下自主運行的組織形式。

⑧ Bill Gates, "AI Is about to Completely Change How You Use Computers" (9 November 2023), www.gatesnotes.com/AI-agents.

朱嘉明 經濟學博士、教授，曾任職於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 (UNIDO)，先後任教於維也納大學和台灣大學，現任橫琴數鏈數字金融研究院學術與技術委員會主席。